

中國近代思想研討會論文專輯

關於康有為與戊戌變法諸問題

湯志鈞

近年來，對康有為與戊戌變法的研究比較活躍，有些問題也展開了討論，持有不同意見。這裏，我只想就康有為和傳統經學、光緒皇帝的「密詔」，以及有關「政變」諸問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康有為與傳統經學

康有為是「先進的中國人」，但他「學習西方」，卻又依附傳統經學。康有為改造今文經學，對儒家學說作重新解釋，建立了變法維新的理論體系，已為人所公認。但他早年「酷好《周禮》」，尊事周公，即對古文經學派所崇奉的書和人表示信從，卻未為人注視。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有為早年酷好《周禮》，賞貫穿之著《政學通議》（「政」，應作「教」），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證以康有為《自編年譜》，他在1886年前，好《周禮》，攻何休，並「貫穿之著《教學通議》，後又棄去」。那麼，《教學通議》將是診視康有為與經古今文問題的重要著作，由於此書迄未露佈，致論者無從闡明。

《教學通議》曾見稿本，列目二十，全書約三萬八千字，上署「光緒十二年正月輯定」，當1886年2月。康有為在《教學通議·序》中，標明撰書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學，由教學之不修也」；「教學之不修」，「患其不師古也」。而所學只是「師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認為「善言古者必切於今，善言教者必通於治」。《教學通議》的宗旨就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康有為認為周公是「言語通治」的典範，經書中的典章都是「周公經綸之迹」；周公「鎔鑄一治」，「以時王為法」，從而「制度美密，纖悉無遺，天下受式，遐越前載」，是「言古切今」的。周公不是空洞說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綱維天下」，「因時更化」，從而大周之通禮會典一頒，天下奉行（《從今篇》）。「教學大備，官師咸修」。康有為講《周禮》官守，崇周公權威，並從周公「有德有位」着眼，恰恰是古文經師的立論所在。他還以六經是「周公之制」，孔子只是「搜括文、武、周公之道」，

「憲章祖述，續承先王」（《亡經篇》），與古文經學家以孔子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相似。

康有為早年尊周公，崇《周禮》，並不意味他算是古文經學家，這時他還「憂患百經未聞道」，還未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他對漢、宋還未專主，也未偏廢，想在各種學說中抉擇汲取，只是想捧出周公的偶像，渴望有「以時王為法」、「頒行天下」的政典，注目於時王，依托於周公，而其實際要求是「變」，是想從周公的「敷教言治」以「言古切今」；以六經的「經綸之言」以「言教通治」。

1888年，康有為趁入京應試的機會，第一次向光緒皇帝上書，請求變法。他也想望光緒皇帝能有周公那樣的輔佐，能有成王那時的郅治。所以上書時，對在朝大臣多方奔走，寄以厚望。他曾上封事請光緒的師傅翁同龢代遞，也上書給曾任軍機大臣、時任工部尚書的潘祖蔭，還請吏部尚書徐桐「感悟上意」，「翻然圖治」，¹又請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長「扶士氣而維國家」。²然而，這些活動沒有達到康有為預期的效果，處於高位者既沒有周公那樣「吐哺握髮」的接待，康有為且飽受各種各樣的譏諷。據說除翁同龢以書中有「讒言中於左右數語」，感到「語太訐直無益」，故不為代遞，「意在保全」，³潘祖蔭「垂接顏色」，「教以熟讀律例」外，⁴祁世長「雅不喜西法，門下士有願為總署、司員者，公聞之輒蹙額，相見必力阻之」，看到康有為上書，自然「不納」。以頑固著稱的徐桐，更「以狂生見斥」⁵ 袞袞諸公，「齷齪保位」，欲求如周公其人，又何其難也。

第一次上書不達的教訓是，大臣阻格，格不上達，不但無「吐哺握髮」的周公，並且尸位素餐，壅塞隔閉。儘管翁同龢對康有為心目中有印象，但在后黨的掣肘下，也乏實際權柄。上書不達的另一教訓是，「虎豹爭守九關，帝關沈沈叫不得」，⁶且遭「朝士大攻」，視為「病狂」。他曾一度消沉，退治碑版，然而「治安一策知難上，只是江湖心未灰」。⁷怎麼辦呢？這曾促使他找尋新的理論依附的必要。

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封建頑固勢力在政治上、學術上都佔統治地位，要尋找新的思想武器，除「向西方學習外，還需從中國傳統學說中去探尋」，使之「言古切

1 康有為：《與徐蔭軒尚書書》，光緒十四年，見拙編《康有為政論集》，頁50—51。中華書局1981年版。

2 康有為：《與祁子和總憲書》，光緒十四年，抄稿。

3 徐勤：《南海先生四上書記》。

4 康有為：《與潘文勤書》，見《萬木草堂遺稿》卷四。

5 康有為：《與徐蔭軒尚書書》後康有為親筆注語。

6 康有為：《己丑上書不達京都》，光緒十五年，見《康有為政論集》，頁75。

7 康有為：《感事》，光緒十五年，同上，頁62。

今」，「言教通治」。只有這樣，才能「聳上者之聽」，才能「鳴其友聲」，才能實現他變法圖強的政治目的。

本來，康有為幼年接受嚴格的封建教育，在外患日迫的情況下，也曾想從陸、王心學、佛教哲學中找尋出路，沒有達到目的，「上書不達」前，對「有德有位」的周公，「奉行天下」的《周禮》是崇奉的，而對煩瑣經學卻認為「學而無用」，為了避免繳繞，他把古文經學的煩瑣，歸之於許慎、鄭玄，不拉扯到「經綸天下」的周公。他瀏覽百家，尚無歸宿，這在他1888年寫給黃紹箕的信中可以看到，信中說：「僕賞謂詞章如酒能醉人，漢學如餛飩能飽人，宋學如飯能養人，佛學如藥能醫人」。「醉」、「飽」、「養」、「醫」，既似褒詞，又含貶義，對這些學術流派都曾探討，卻未找到出路。

就在第一次上書不達，回到廣州時，晤見今文經學家廖平，今文經學是講微言大義，主張通經致用的。康有為鑑於外患日深而上書不達，又受了廖平的啓示，覺察陸、王心學雖「直捷明達，活潑有用」，但不及今文學的「靈活」，佛教哲學雖講「慈悲普度」，但「與其佈施於將來，不如佈施於現在」。這樣，便想從今文經學中汲取可資運用的東西進而議政，在他的撰著中，也才有了前所未有的今文內容。

康有為冥思苦索，俯讀仰思，他要掙脫封建制度的束縛，又擺脫不了傳統思想的羈絆，於是回過頭來再向傳統文化中尋找偏方，好像急病求醫一樣，依援的還是「孔子舊方」，這又反映了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也說明了中國封建傳統影響是何等頑固，精神枷鎖是何等嚴酷。

二、關於光緒皇帝的「密詔」

戊戌政變前夕，光緒皇帝頒發的兩道「密詔」，是研究維新運動的重要資料，也是康有為後來保皇活動的主要憑借。近年來，對「密詔」的來源、時間、內容、性質諸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注視，如台灣黃彰健先生即有專文考核，爬梳資料，反覆論辨。⁸我過去也曾對此試作剖析，但未鞭辟入裏。⁹此後續有所得，對它的來源、內容也有一些新的認識。

較早提到「密詔」的是1898年9月27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的《字林西報》。接着，香港《孖刺報》（*China Mail*）刊載該報記者10月6日（八月二十一日）與康有為的談話。¹⁰10月17日（九月初五日），上海《新聞報》載康有為的《公開信》，

8 黃彰健：《康有為衣帝詔辨偽》，見《戊戌變法史研究》，1971年6月台版。

9 拙撰：《關於康有為的密詔》，見《戊戌變法史論叢》，1957年1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版。

10 談話記錄為《字林西報》1898年10月15日（九月初一日）轉載，譯文見《戊戌變法》第三冊，頁506—511。

中附「密詔」，並於10月20日（九月初十日）由《字林西報》譯出。10月25日（九月十一日）《台灣日日新報》有《清帝密諭》，謂「從友人處抄得康主事有為所奉密詔兩道，乃洞明是事之源委，爰急刊佈以告天下」，下有詔文。12月21日（十一月初九日），日本外務省收到日本駐上海總領事代理一等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抄送《康有為事實》和康有為《奉詔求救文》）錄有兩道「密詔」。¹¹《台灣日日新報》在1899年1月29日（十二月十八日），又將《奉詔求救文》刊出。5月，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印出，在第二篇第三章《戊戌廢立詳記》中也將「兩諭揭載」。¹²

慈禧死後，楊銳之子楊慶昶於1909年（宣統元年）將第一道「密詔」呈繳都察院，趙炳麟時掌軍機，「疏請宣付實錄」，¹³並將此詔錄入趙氏所編《光緒大事滙編》卷九。後來羅惇融《資退隨筆》也錄兩詔。¹⁴康有為去世後，《康南海先生墨迹》印行，中有「密詔」兩通，但它是抄件。

「密詔」刊佈情況，略如上述。

如今看到的「密詔」，來源不一：一是楊銳之子楊慶昶繳呈的第一詔，即《光緒大事滙編》卷九所載；二是報刊上登出的兩道「密詔」全文，如《新聞報》、《字林西報》、《台灣日日新報》；三是羅惇融之由王式通、趙熙「錄以見示」的；四是康有為、梁啟超記述的，如《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奉詔求救文》、《致英國駐華公使照會》、¹⁵《戊戌政變記》、《康南海先生墨迹》。

在這四類中，羅惇融所錄第一詔來自楊慶昶所繳呈，文字稍異，第二詔或據報刊傳抄。至於報章所載，最早刊登的《新聞報》，前有康有為的信件，日本外務省檔案和《台灣日日新報》也是附在康有為《奉詔求救文》之後。那麼，兩道「密詔」的來源，實際是兩個：一是楊銳之子，一是康、梁，前者只有一道，後者則有兩諭。

這兩道「密詔」，第一道由楊銳之子繳呈都察院，趙炳麟據以錄入，這時慈禧、光緒剛死不久，在他的呈文中，述及手詔「令其珍藏」及楊銳「復奏大綱」經過，¹⁶自有根據，趙炳麟據以錄出，當為可靠（下簡稱「楊本」）。但它和最早用中文刊出的《新

11 《康有為事實》和《奉詔求救文》，均見日本外交史料館：外務省檔案《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1-6-1-4-7-2，前者編號為491183-491211，後者編號自491222起。又，此項檔卷，曾編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一卷第二冊，有「密詔」全文。

12 《戊戌政變記》初在《清議報》連載，自第一冊至第十冊而止，當1898年12月23日至1899年4月1日，沒有第二篇。1899年印行單行本時始補入。《出書廣告》，見《清議報》第十三冊，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又日本外務省檔案秘甲204號有《清國人書籍出版件報告》，專門報告《戊戌政變記》出版，報告為5月28日，知五月已出。但《飲冰室合集》本則有刪改，內容也有更動。

13 趙炳麟：《諫院奏事錄》卷六《請宣佈德宗手詔編入實錄疏及再疏》。

14 見《庸言》第一卷第三號。

15 署光緒二十四年，見蔣貴麟編《萬木草堂遺稿外編》下冊，頁521，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

16 黃尚毅：《楊叔嶠文集》卷首，成都昌福公司刷印本。

聞報》卻有差異，和以後出自康、梁各本也有不同（下簡稱「康本」），主要區別是：

一，「楊本」是「仰體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感到自己「權力實有未足」，既想改變舊法，「而又不敢有拂聖意」，從而頒詔，囑「妥速籌商」的。詞意婉轉，內容近實。而「康本」則一開始就從「朕維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着眼。「楊本」只說如果「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則「朕位且不能保」。「康本」則作「今朕位幾不保」，語氣大異。

二，「楊本」作「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而「康本」初刊時作「汝可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查「密詔」交楊銳傳出，諭中「爾」應指楊銳，不應再有「楊銳」之名，下面為林旭、劉光第、譚嗣同三人，則傳諭軍機四卿，原無康有為之名。「康本」在《新聞報》初刊時，「爾」作「汝」，說是「汝可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云云，變為「密詔」是交給康有為的了，後來且寫成「汝康有為……」，把康有為的名字都寫上去了。顯然，這是中經竄改。¹⁷

照此說來，「楊本」和「康本」的不同在於：「楊本」只說變法危機，囑軍機四卿想出既能「轉危為安」，又不「有拂聖意」的「良策」，而「康本」則明言「朕位幾不保」，囑「設法相救」（「設法相救」四字，即為「楊本」所無）。「楊本」的「爾」指楊銳，諭交四卿；「康本」的「汝」指康有為，後來且逕添康名。¹⁸顯然，「楊本」是真詔，而「康本」則經改竄。它不是一般傳抄錯誤，而是另繕重寫；不是稍有增刪，而是改易諭意，關鍵之處是「設法相救」和把「密詔」說成是寫給康有為的。

至於光緒皇帝的第二道「密詔」，在《新聞報》最早發表時作：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遲延。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有厚望焉。特諭。

《台灣日日新報》無首三句，一開始為「汝可迅速出外」，「將來更效馳驅」下增「共建大業」四字。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戊戌政變記》、《賓退隨筆》有首三句，下與《台灣日日新報》同。

日本外務省檔案則作「汝可迅速出外國求救」下有「共建大業」。¹⁹

17 即第二次「密詔」，也作「汝」，未見康有為之名。

18 即袁世凱：《戊戌日記》亦謂譚嗣同見到「密詔」後，至袁世凱處出示「墨筆」所書，也說「亦仿佛上之口氣」，下云：「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只有四卿，沒有康名。

19 《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一卷第一冊，頁714載此詔，「求」下落「救」字。

《康南海先生墨迹》「共建大業」四字則添加於右側。²⁰

第二道「密詔」是給康有為的，與第一詔之另有楊慶昶繳呈之本不同。它既乏原件，又只有康有為一個來源，無法判定「真詔」。但即就康有為歷次所說，也有不同。如最初只有「汝可速出外」，後來在《奉詔求救文》下加了「國求救」三字，意義就大不相同。至少可說「國求救」三字是初刊沒有，後來出現的；「共建大業」四字也值得懷疑。²¹

照此說來，兩道「密詔」，均有改竄，其關鍵之處，除表示寫給康有為外，是在「設法相救」、「出外國求救」；而第二詔之加上「國求救」三字，又是在《奉詔求救文》後添加上去，作為「奉詔」、「出外國求救」的張本的。

由於康有為將「密詔」改竄，王照又稱為偽作，引起了人們的懷疑，甚至懷疑光緒是否有此詔書，而予根本否定的。我認為，這還得具體分析：

第一，光緒皇帝是曾經發下兩道「密詔」的，第一道「密詔」交由楊銳帶出，宣統元年，楊銳之子繳呈都察院，說明確有其事。又據《諭摺匯存》：「三十日，召見軍機及崇禮、楊銳」。「三十日」，（七月，夏歷，下同）即第一詔發出之期。第二詔於八月初二日由林旭傳出，同日，光緒頒發明諭：「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遲延觀望」。²²「密詔」首言「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明諭飭其迅速離京，「密詔」再予慰勉，合乎情理。再查《諭摺匯存》：「八月初二，召見軍機及袁世凱、成勳、周蓮、周春瀛、林旭」。與《康南海自編年譜》：「初三日早，噶谷持密詔來」，梁啟超：《南海先生詩集·明夷閣詩集》下「按語」：「第二次乃八月初二日，由四品卿銜軍機章京林旭傳出者」相合，即袁世凱在八月初三見譚嗣同持來墨筆所書「密詔」，也說「亦仿佛上之口氣」，知「密詔」是確實有的。

第二，王照稱之為「偽作」，但他並未說沒有「密詔」。即就後來發表的《與木堂翁筆談》來說，也只說「今康刊刻露佈之密詔，非皇上真密詔，乃康偽作者也」。只說「康刊刻」之「密詔」為偽，又此項筆談為「輾轉傳鈔者」，如今日本岡山木堂紀念館所保存的王照與犬養毅（木堂）筆談原件則作：

20 《康南海先生墨迹》所載兩道「密詔」，旁邊均有增添，第一詔增「而用通達英勇之士」，第二詔增「共建大業」，《台灣日日新報》、日本外務省檔案並同，可知同一來源。又，第一詔所加，楊慶昶繳呈之件中省此句，想係康有為後來憶及補上；而第二詔是否原有「共建大業」，則值得懷疑。

21 據《康南海自編年譜》，康有為接「密詔」後，曾草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噶谷持還繳命」。查康有為：《謝奉到衣帶密詔摺》作「迅速出外」，有「共建大業」，無「國求救」，僅摺謂「臣奉詔求救」，見康同璧編：《萬木草堂遺稿》卷三。又康有為未刊文稿《請欽派督辦官報摺》也無「國求救」，「共建大業」。《康南海先生墨迹》也作「迅速出外」，而「共建大業」則添加右側。《台灣日日新報》、日本外務省檔案等也就有了「共建大業」。《墨迹》兩詔添加兩句，自致疑竇。

22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四二六，頁2。

皇上本無與太后不兩立之心，而太后不知，諸逆賊殺軍機四卿以滅口，而太后與皇上遂終古不能復合。今雖欲表明皇上密詔之實語，而無證矣。惟袁世凱亦曾見之，而軍機之家屬亦必有能證者。然榮祿、剛毅譖皇上以擁太后，此時無人敢代皇上剖白作證，天下竟有此不白之事。²³

這件筆談，不但說明確有「密詔」，還說「諸逆賊殺四卿以滅口」。他提到的袁世凱、四卿家屬，「必有能證者」，也有根據。袁世凱《戊戌日記》既有記載，楊銳家屬也持以繳呈，可見王照是承認光緒發過「密詔」的。

因此，我認為光緒皇帝是發過兩次「密詔」的，但經過康有為的改竄，他將第一詔改為寫給自己，無非表示他奉有「衣帶詔」，是「奉詔」，是能代表光緒旨意的；至於加上「設法相救」、「出外國求救」，又是他為政變後流亡海外，保皇復辟作輿論準備，表示「奉詔求救」。

三、關於戊戌政變

關於政變的日期、原因以及袁世凱是否「告密」等，近年都有專文論辨。我認為，八月初六日「政變」說是對的，袁世凱也確曾「告密」。由於牽涉史料考證，言之絮絮，茲不贅言。

這裏只想就日本伊藤博文的來華和政變的關係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伊藤博文於1898年9月11日（七月二十六日）「入天津」，²⁴次日，拜見榮祿。14日，至北京。15日，拜見總署王大臣。18日，康有為謁伊藤於日本公使館。²⁵20日，覲見光緒皇帝於勤政殿，次日，政變發生。

伊藤來華，資產階級改良派是寄予厚望的，光緒皇帝也親自接見，感到「快慰之至」。

康有為主張效法日本明治維新，進行改革；在上皇帝書中就一再籲請。他對助成明治維新事業的伊藤早有好感，在他呈送的《日本變政考》中也不止一次地推崇伊藤，如對裁汰冗員，說「日本舊俗既然，中國尤甚。……伊藤所改，亦切中吾弊，深可鑒也」（卷九）。如言設制度局，請「日本選伊藤為之，至今典章皆其所定」。並謂「觀日主之於伊藤，並可謂知而能任，任而勿貳者矣」（同上）。這樣，康有為得知伊藤來華的消息時，自然寄予極大希望。他到日本使館專門拜謁了伊藤博文，談了「皇上在位且二

23 王照與犬養毅筆談，日本岡山木堂紀念館藏，手迹一紙，邊注「王照，北京人，禮部主事」。

24 伊藤博文：《清國旅行日記》，《伊藤關係文書》未刊部分，下注明為「先考手筆」，當為伊藤手書。

25 同上。

十餘年，權實皆在太后之手」，以及慈禧專任奕訢、榮祿、剛毅等「絕無見識」之人，阻撓新政。並請伊藤謁見慈禧時，「極言皇上賢明，而改革之事，為諸外國之所深喜」，以使慈禧「回心轉意」。²⁶此外，還授意楊深秀、宋伯魯先後上疏，「先為借箸之謀」，「速簡重臣，結連與國」，派員往見伊藤博文等「與之商酌辦法」。²⁷

光緒皇帝對伊藤博文同樣存有幻想。當他召見康有為，聽康談到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強」時，深感興趣。後來《日本變政考》陸續進呈，光緒曾參照康有為的建議，明治維新的「成效」，頒佈過一些上諭。等到伊藤謁見，光緒即說：「貴國自維新後，庶績咸庶，皆出貴侯手定，各國無不景仰，無不贊美，朕亦時佩於心。」又請將利弊、興革「筆之於書」。²⁸

資產階級改良派對伊藤博文寄以厚望，光緒見到伊藤表示「快慰」。這樣，伊藤的來訪，成為「百日維新」中的一件大事，也就必然遭到后黨的嫉妒和反對。伊藤謁見光緒的第二天，「政變」猝發，當不是偶然的。

只要看，伊藤謁見光緒前兩天，楊崇伊請慈禧「即日訓政」摺稱：「康有為等兩月以來變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開，以位置黨羽。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來京，將專政柄。臣雖得自傳聞，然近來傳聞之言，其應如響。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²⁹這種危詞聳聽，慈禧自然不能不為所動。

事實上，改良派和光緒準備「借重」伊藤之說，當時確有傳聞，且曾刊諸報章。如《國聞報》載：「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請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為顧問官，優以禮貌，厚其餼廩，持此議者甚多。」³⁰同時，改良派確曾通過帝黨擬請伊藤為顧問，上述楊深秀、宋伯魯的奏摺中，均提到「借箸之謀」，伊藤謁見光緒時，光緒也表示對伊藤「時佩於心」，又請伊藤詳晰利弊，於總署王大臣會晤時，將興革事宜，「筆之於書」。垂詢興革，請予顧問。

儘管光緒沒有正式任命伊藤為顧問官，而已有人上摺疏薦；在實際接觸中，光緒也對創維新大業的伊藤表示關切。這些舉動，當然不能為后黨所容忍。

再則，從伊藤在華的言行，也可看到他「顧問」新政的跡象。他初到天津，即行表示：「中國如有諮詢相助之處，甚願竭誠相助。」謁見光緒時，又祈求光緒「永保盛業，長享景福」，準備在王大臣問及改革事宜時，「竭其所知以告」，以使今後兩國「邦交必能因之愈固」，對中國的維新事業是「深為垂注」的。當然，這與甲午戰後，帝俄在

26 《游清紀語》，《台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十五日。

27 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頁15，170。

28 《清國皇帝陛下謁見之次序》，明治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手稿。

29 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頁161。

30 《伊藤至北京情形》，《國聞報》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華勢力的擴大和慈禧為首的清政府親俄有關，和日、俄之間爭奪我國東北地區的矛盾激化有關。

伊藤的用心，后黨不會不察覺，改良派和光緒對伊藤的態度，后黨也不會不提防。對伊藤的動向、光緒的動態，隨時有人稟告慈禧，慶奕劻就是一個，只要看，楊崇伊的請慈禧「即日訓政摺」是奕劻密呈的，奕劻活動頻繁，內外接引，這和「政變」的發生，無疑是有關連的。

照此說來，伊藤的來華，促成了后黨的發難，加速了政變的步伐。蘇繼祖：《清廷戊戌變記》說：「八月之變，幽禁皇上，株連新黨，翻改新黨，蓄此心固非一日，而借口發難，實由於伊藤之來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1898 Reform and K'ang Yu-wei

(A Summary)

Tang Zhi-jun

1. While it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rough a remoulding of new text learning in classical studies and a re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doctrines K'ang Yu-wei 康有為 succeeded in setting up a theoretical system for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t has, up to now, not been brought to public notice that in his early years he was very fond of *Chou li* 周禮 (*The Book of Chou Rites*) and idolised Chou Kung 周公 (the Duke of Chou); in other words, he respected personages and works held in high esteem by scholars of old text learning.

K'ang Yu-wei wrote in 1886 an essay entitled "Chiao-hsüeh t'ung-yi" 教學通議 (General Discourse on Education), in which he put forward the idea that the Confucian teachings should be properly used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and the ancient precepts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such a way as to fit in with the modern age. He considered Chou Kung as a model of those who carried through such sublime ideas and regarded such decrees and regulations as contained in the *Chou li* as "indications of the statecraft possessed by Chou Kung." The Duke "had a noble character and held a key post," "renovated with the times," and was therefore "obediently followed by all people under Heaven." He maintained that the six classics were "what Chou Kung instituted," while Confucius did no more than to comply with ancient sages and follow them. In this connexion, K'ang Yu-wei intended both to make explanations of ancient precepts fit in with the modern age in accordance with Chou Kung's policy of developing education and preaching law and order and to make use of the Confucian teachings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contained in the six classics.

In 1888 K'ang Yu-wei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f his visit to the capital to tak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to submit for the first time a memorial to Emperor Kuang-hsü 光緒皇帝, proposing a constitutional reform. He had hoped that the emperor might be able to have a minister like Chou Kung in ruling over the country and also to initiate an epoch of good government as did Ch'eng Wang 成王 (King Ch'eng) of Chou dynasty. However, his memorial never reached the emperor, as there were a number of ministers who stood in his way. He was, besides, confronted with fierce attacks from the courtiers, which forced him to look for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As a result he drew from his new text learning what was available for his further intervention in political debates. On that score there appeared in his works hitherto unheard-of contents of new text learning.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2. On the eve of the 1898 reform Emperor Kuang-hsü issued two confidential imperial edicts, of which sources varied and contents differed. These edicts had probably gone through some falsification by K'ang Yu-wei, who changed the first one as though it were addressed to himself. On that pretext he professed to have received an imperial edict generally known as *yi-tai-chao* 衣帶詔 (an edict smuggled out of the palace by sewing it into the girdle of a robe when the emperor was under house arrest), to which he added such phrases as "to try to offer support" "to go abroad to ask for help," which became an advance hint for him to go abroad into exile after the *coup d'état* with a view to "asking for help in obedience to the imperial edict."

3. Prince Hirobumi Ito 伊藤博文 arrived at Tientsin 天津 in September, 1898. On the 14th day of September he reached Peking 北京. On the 20th day he had an audience with Emperor Kuang-hsü in Ch'in Cheng Tien 勤政殿 (the Hall of Diligent Administration), and on the following day there was the *coup d'état*.

K'ang Yu-wei and his companions placed their ardent hope on the arrival of Prince Ito in China, while Emperor Kuang-hsü was pleased and heartily gratified to meet him. They were anxious to rely on him for support and also to get him to act as their adviser. He showed in return profound solicitude for the Chinese reformist cause.

It was improbable that the Empress Dowager's Party was unaware of the intentions cherished by Prince Ito and the attitude which Emperor Kuang-hsü as well as K'ang Yu-wei and his companions took towards the prince. Yi K'uang 奕劻,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trusted follower of the Empress Dowager, was engaged in frequent activities and got in touch with people inside and outside. It would be safe to say that the arrival of Prince Ito incited the Empress Dowager's Party to take preemptive measures and quickened the pace of the *coup d'état*. Indeed, it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oup.